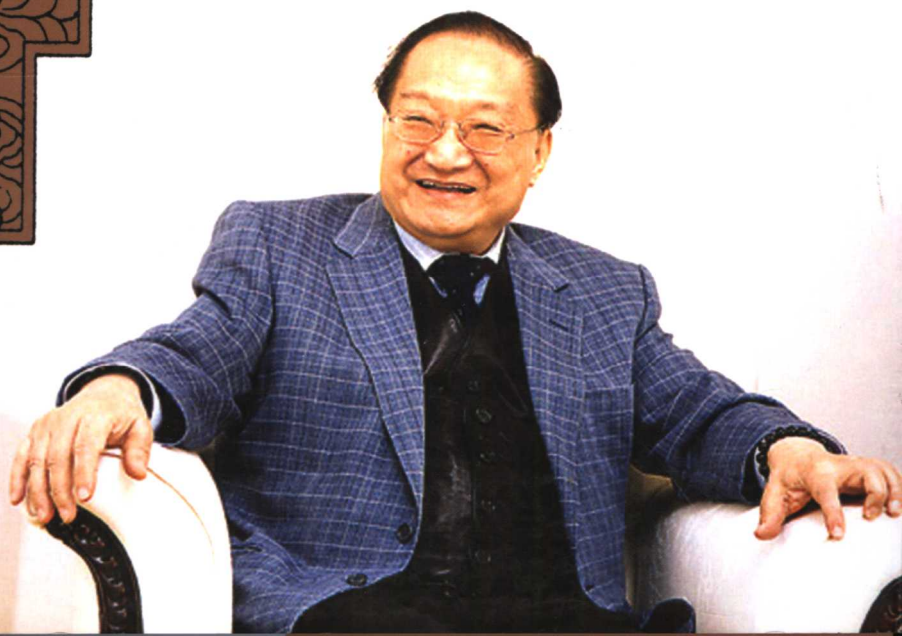


金庸小说的 文化意蕴

曹布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J207.42
C103

金庸小说的 文化意蕴

■ 曹布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 / 曹布拉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6

ISBN 7-213-02766-2

I. 金… II. 曹… III. 金庸—侠义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100 号

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

曹布拉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 85176516

责任编辑 周 游

封面设计 邵文龙

责任校对 戴文英

激光照排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杭州市玉古路 20 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1

字 数 23.8 万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766-2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我在撰写《金庸笔下的奇男情女》(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一书时,就打算接着写关于金庸小说文化意蕴的文字。一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二来人们对于金庸小说最大的争议也在于此,或褒或贬都拿金庸小说中的“文化”做文章。我们在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时,最直接的感受有两个:一是金庸小说相对于传统的侠义小说而言,确实有新意,读者无不感到新奇有趣;二是金庸小说里融会了那么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无论器物、制度还是思想无不涉及,并以他的生花妙笔,把中国传统文化描绘得多姿多彩,魅力无穷。这两个感受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之所以感到新奇,认为金庸小说有“新意”,除了他运用新文学的笔法来塑造古代侠士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抒写他们如天马行空般自由不羁的人生历程,虚构了许多色彩斑斓的人生奇境等等之外,更重要的是呈现在他作品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今许多读者而言,已显得相当陌生。也就是说,首先,当下人们所处的文化语境,与金庸小说中所呈现的文化语境已有了很大的差别;金庸小说中人们的处世方式、人生信念、道德追求和审美理想等等,与今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其次,我们又会觉得,金庸笔下的人物,确实又完全是中国化的,他写的是中国人的故事和梦想。他们的处世方式、人生信念、道德追求和审美理想等等,我们似曾相识。他们与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庸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对于我们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好像是我们在街头突然邂逅一位阔别多年的朋友,一下子勾起了记忆深处被尘封许久的琐屑往事。因其“陌生”,我们感到新奇;因其“熟悉”,我们才容易接受。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奇特的感觉,原因十分复杂。有一个

趋势倒是很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方面的东西，正在迅速地离我们远去，以致我们在阅读金庸小说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怀旧心理，似乎是面对着一个行将消失在高楼大厦下面的历史遗存。

金庸在“现代化”的香港这个环境中，在“全球化”呼声日益响亮的时代里花费数十年精力，不遗余力地书写“历史遗存”式的武侠小说，先在海外华人圈中引发阅读的热潮，又在大陆赢得了为数上亿的读者欣赏，内中的缘由确实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许多年来，进化论已牢固地成为我们的思维习惯，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心理，“向前看”和“向前走”成了我们本能而又高尚的冲动。我们坚信“未来”总是新的、对的、合理的、美好的，我们的任务似乎就是急于告别旧的、错的、不合理的、丑陋的“过去”，快速地奔向“未来”；与“过去”的决裂愈彻底、愈干脆，则奔向“未来”的速度就愈快。进化论的理论诚然是不错的，它已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得到证明。从宏观的历史视域来看，人类社会总是由比较低级的阶段，向着比较高级的阶段在逐渐“进步”。但是对于进化论的过分迷信，也会使我们产生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比如在谈到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时，我们总是很轻易地把它看作是一种“过去”的东西，从而就用很轻率的态度来对待它，认为它的存在只会绊住我们匆匆向前的步伐，故是应该消亡、消亡得越快越好的东西。把传统文化设定为“过去”的东西，来讨论“过去”与“现在”、“未来”的关系，其实就如同把源源水流般的时间人为地割断，分为几截，这也就是否定了时间的连续性。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既为“传”与“统”的文化，便是当今人们无法选择的先天存在。每一个人，不管他愿意与否，只要一来到人世间，就来到了某一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个从“过去”传来的路径，又有在当下统合的形态。任何一种现存的传统或文化传统，即如源源不断的时间之流那样是无法人为截断的。在“传”与“统”中不断地扬弃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承继一些仍有生命力的

东西，整合融会一些外来的东西，并且在人们当下的活动中创造出一些新鲜的东西。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它必然是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并不仅仅是“过去”的文化。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从总体而言，就是这样一种能够统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生命力、有前途的文化。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确实有许多不合时宜、腐朽的东西，譬如其中那令人厌恶的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专制观念、盲目的自大心理、奴隶意识及奴隶总管意识等等，都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抛掉。同时，其中一些对“现在”和“未来”仍然有益的东西，那就应该积极地承继下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之发扬光大，譬如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义”先于“利”的思想，平等对待各民族的思想，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思想，爱家爱国的观念，等等。现实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应该扬弃与应当传承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还做得不到位。这，也许就是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金庸武侠小说在当今时代热销的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我在这本小书里，对金庸小说中的文化意蕴的历史渊源做了一些梳理的工作，但因本人才疏学浅，这个工作也可能没有做到位，只好请尊敬的读者们多多谅解了。

作 者

2003年8月

自序 /1

第一章 金庸小说论争的焦点 /1

一、一场热闹的争论 /1

二、金庸的文学主张 /7

三、金庸的文化观 /13

四、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 /20

第二章 义：侠的牺牲精神 /26

一、关于“武多侠少”的批评 /26

二、武侠与传统 /32

三、英雄与义 /39

四、普通人与义 /46

五、“坏人”与义 /52

第三章 勇、信：侠的行为准则 /59

一、两种选择：兼善与独善 /59

二、先秦各家对“侠义”的推崇 /64

三、墨、兵家与侠之勇 /69

四、侠之信 /77

第四章 儒家道德理想及人格范式 /83

一、儒学是否已死亡 /83

二、仁与爱 /87

三、“忠”与反个人崇拜 /90

四、师父崇拜 /99

五、人格理想 /102

六、生命价值的不对称问题 /108

第五章 玄妙境界：道家人生姿态与思维方式 /112

一、道家文化渗入小说 /112

二、对名利的拒绝 /114

三、对恩怨情仇的超越 /122

四、玄妙：武功中的哲理 /126

五、道家与道教 /131

六、全真道、王重阳、丘处机与张三丰 /136

第六章 出世与入世：佛教文化的两重性 /146

一、佛教的冷与热 /146

目 录

- 二、佛教文化与现代文学 /150
- 三、苦：金庸对人生的感悟 /156
- 四、《天龙八部》与佛学 /164
- 五、救苦救难 /172
- 六、悟：特殊的思维方式 /177

第七章 名士风流与隐逸文化 /183

- 一、成群的另类人物 /183
- 二、对正统的偏离与反叛 /188
- 三、外形美与内在美的统一 /195
- 四、性情：特殊的精神品质 /197
- 五、名士与侠士 /201
- 六、隐逸与儒道思想 /205
- 七、千古文人隐士梦 /207

第八章 仁爱、兼爱与情爱：东西文化的融合 /211

- 一、东西文化语境中的“爱” /211
- 二、英雄人格与性爱 /216
- 三、女性：爱情至上主义者 /224
- 四、亲情的力量 /230

第九章 武侠世界的人文精神 /235

- 一、关于人文精神 /235
- 二、敬与爱：师徒之间 /240
- 三、基于人格平等的友谊 /246
- 四、情义无价：男女之间 /251
- 五、恩义：超越尊卑贵贱 /259
- 六、尊严：敌我之间 /266

第十章 武学中的传统文化 /270

- 一、武侠小说离不开武 /270
- 二、金庸的“武功” /274
- 三、武功与文艺 /278
- 四、武功的德性与知性 /286
- 五、金氏“内功”的求 /294
- 六、阴阳五行与八卦 /301

主要参考文献 /309

第一章 金庸小说论争的焦点

一、一场热闹争论

1999年11月1日，时不时在中国大陆文坛制造新闻事件的北京作家王朔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刊出了《我看金庸》一文，又制造了一则后来引起一场笔战的“新闻”，该文像一枚重磅炸弹，掷向了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十五部新武侠小说征服了大陆千千万万读者的香港作家金庸和金庸的崇拜者——“金迷”们。接着，金庸先生在11月5日的《文汇报》和香港《明报》月刊12月号上以《不全之虞和求全之毁》、《浙江港台的作家》两文回应。两大知名人士的世纪末过招比试，使得寂寞的文坛出现近年难见的热闹景观：各类作家、批评家及非作家、非批评家挥毫上阵，有的拥王，有的助金，纷纷站队列阵。其中不乏情绪激动、慷慨激昂者；也有在一边细声细气拉架劝解的和事佬，有各打五十大板的裁判员，也有冷眼旁观，冷不丁插一嘴的闲人，还有貌似公允，言不及义，只为喊一嗓子以证明自己存在的高人。总之是各色人等逮着了机会，轮番登场，为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演了一出热热闹闹的好戏。

王朔并不是中国大陆作家里第一个对金庸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同在1999年里，在王朔亮相之前，何满子先生已在6月23日的《文汇报》，8月12日和10月28日的《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为武侠小说亮底》、《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三篇文章，只是因为何文还是泛论武侠、言情的不是，不像王朔那般直接挑战金

庸，也因为何氏的“名人效应”不及王氏，还因为何文的风格不像王文那般张牙舞爪、尖刻辛辣、京油子味十足，所以何满子先生的此前三文，并没有吸引太多的注意力，也收不到王文那种石破天惊的轰动效应。

掠去王朔的文章行文方式上那层“京骂”式的浮沫后，可以清楚地看出，王朔批评金庸，主要是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一、胡编乱造；二、情节重复，行文啰唆；三、人物性格模式化；四、小说语言是旧的、死的；五、立意不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在弘法的幌子下海淫海盗，还给那些无法无天的侠客脸上贴金；六、虚构了一群如同野生动物的中国人的形象，从而给世界很大的误会；七、中国资产阶级作家的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里。

王朔的这篇随笔是一个小说家的批评，他不喜欢金庸小说，反感甚至厌恶金庸小说，并且把这种个人感受用完全个人化的言辞说了出来。他的七点看法里，一、二、三、四基本上是批评金庸小说的艺术性的低劣与庸俗，属于对小说艺术的价值判断；五、六、七三点批评金庸小说的“社会效果”和作家精神世界的“落后性”，属于对作品思想价值的判断。

而在王朔前后另一些批评家对金庸小说的不满，归纳起来，大致上是：

一、武侠小说是与新文化对抗的旧营垒的



唐·顺陵石狮

文学，是“死的说教者”，与旧制度、人治社会、非科学、不民主的现实、意识和风习相联系，违反新的人文精神。（何满子《为武侠小说亮底》等三文都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即：武侠小说是对新文学的反动，是新文学的对立面。另外有杂文作家鄢烈山早在1994年12月4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拒绝金庸》一文中说：“武侠小说从根本上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

二、金庸武侠小说只具娱乐性，他制造侠义文化的幻觉，把封建文化浪漫化，以迎合当代社会功利主义、金钱本位带来市民阶层渴望逃避、隐遁的心理。（葛红兵《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载《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期）

三、武侠文学对中国历史社会并没有多少正面的参与和积极的推动价值，而侠义对秩序建立不利。（葛红兵、刘川鄂、邓一光《金庸：被拔高的“大师”》，载《南方论坛》1999年第5期）

四、与欧美科幻小说的英雄靠科学知识、假借外力行事相比，中国武侠小说的英雄是单拼人力，靠自身超人的武功行事。欧美科幻小说主要表现人对自然的征服，注重向外部世界的开掘，体现了幻想的外向性；而中国武侠小说局限于人类内部的争斗，注重向内里探索，开掘自身能力，体现了幻想的内向性。因此，中国武侠小说劣，欧美科幻小说优。（赵立功《王朔“俗”中的雅，金庸“新”中的旧》，载《中国教育时报》1999年12月1日）

五、金庸是炫耀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贵族”，他迎合没有学问的人的学问要求，把诗、词、曲、赋这些古典文人的耍玩之物发挥到极致，半文半白的叙事语言，给大陆读者形成语体上的陌生化效果，以满足大陆读者的猎奇心理。金庸虚构的英雄离现实生活太远。（葛红兵《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

六、金庸小说中充满了“帮派之争”，联系近十年来中国在

农村有宗法组织复兴，在城市有黑社会的复兴，似乎有因果关系，它阻碍了现代化与公民意识的确立。（王彬彬《金庸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载《羊城晚报》1999年11月18日）

七、武侠小说是害人的，因为近十几年来，随着武侠小说的风靡，封建迷信、巫术泛滥，使少年读者想入非非，群起仿效，增加社会动荡的因素。西方骑士文学因其荒唐已经被斥为垃圾而寿终正寝，更加荒唐的武侠小说也不能逃脱覆灭的下场。（郑文庆《骑士文学：武侠小说的镜鉴》，载《光明日报》2000年6月22日）

八、总体构思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袁良骏《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

九、刀光剑影，打打杀杀，惨不忍睹。（同上）

十、将武侠置于历史之上，以假乱真。（同上）

十一、拉杂、重复、啰唆，为了能发财致富，有意拉长篇幅。（同上）

十二、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早该退出历史舞台。（同上）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王朔与他以往外在于“知识分子”的姿态不同，他和众多的批评家一起，都采取了同一个“正统知识分子”的批评立场，他们都“把自己置于五四新文化——30年代‘左翼’文化——1949年后革命文化——‘新时期’文化这一条主流脉络中”（吴晓黎《书写文化英雄·90年代文化中的金庸》，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所不同的，那就是王朔在怀着自己这一拨人没能像金庸那般受到公众欢迎的委屈情绪的同时，仍然使用他在向名家叫板时的一贯风格：谩骂式批评。而许多批评家只是有风度地重复了王朔意见中的某一点或某几点，并没有提出更多新鲜的、更有深度的见解。有的批评家用力在对金庸小说进行严厉的“政治判决”，他们从神

圣的观念和圣洁的情感出发，声言用不着读金庸小说的文本，就可以断定它是腐朽之物，理应“铁帚扫而光”，呼吁某一种文学以外的强大力量站出来消灭金庸小说以净化社会风气和文坛；有的批评家是借金王之争说自己的话——如同前面所说的乘机喊一嗓子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以免使得自己在热闹场合受到冷落；也有一些批评家确实是敏锐地看到了金庸小说与“纯文学”的不同之处，用对“纯文学”的评价尺度来衡量金庸的武侠小说；有的则是在金庸小说里找到了中国不如外国（西方）的有力证据……总之，否定金庸的批评家们，总体上来说似乎也没有真正想把这场论争进行下去的意思或打算——也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不屑于在这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上花费更多的精力。所以，沸沸扬扬地热闹了一阵子后，很快也就偃旗息鼓、无声无息了——这使人们对金庸小说的真正有说服力的批判的期待落了空。

自从金庸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大陆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有许多学者关注着金庸小说，解析金庸小说，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金庸小说研究的论著，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一些大学也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或讲座，对金庸小说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学理性探讨。这是因为，金庸既然是当代中国拥有读者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小说自20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风靡华人世界已近半个世纪，又是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电子游戏软件最多的以古代社会侠义斗争为内容的文学作品，还是读者文化修养跨度最大的作家，“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金庸：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其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受众之广，几乎无人可比。金庸小说成了一种独特的文

化现象，甚至有人在给 20 世纪的文学大家排座次时，将金庸列为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茅盾之前的“老四”（前三位是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是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王一川《重排大师座次》，载《读书》1994 年第 11 期）；不少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给予金庸小说感情色彩浓烈的高度评价，有的认为：“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第 209 页）有的认为：其小说的结构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冯其庸《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 2 页），“几乎没有第二个中国作家像金庸那样在小说中将如此广博的知识信息熔于一炉”（廖可斌《金庸小说论争集·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 页），有的断言：“也许用不了多少年，人们就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新发现一位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发现一部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伟大的巨著。”（陈墨《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 3 页）“金庸武侠小说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中国文学的代表，完全可以与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相提并论。”（徐尚扬《金庸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4 页）金庸小说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在思想的深刻、独到方面，不亚于新文学大师的杰出作品”，“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第 209—211 页），等等。也许正是如此这般热情的评价，才激发了那场对于金庸小说的否定性批判而引发的新闻性远远大于学术性的“王金论争”。在一些

学者们看来，毕竟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属于通俗文学，而通俗文学如何能当得起这般高的赞誉？毕竟武侠小说写的都是子虚乌有、离奇古怪的故事，哪怕再高妙、再新奇，如何能入大雅之堂？

二、金庸的文学主张

有意思的是，与海内外的媒体和批评界的热烈关注相比，金庸却一再低调地声明：自己写武侠小说，不过是为了自娱娱人，最好不要与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我的武侠小说只有娱乐性”（《金庸茶馆·三卷》，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211页），“我的那些小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小说就主题思想、文学价值各方面来说，固然不能与鲁迅、巴金等大师并列，也远远及不上茅盾及近代、当代的其他许多小说家”（《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第211页）。他回应王朔的两篇文章，也敦厚大度，谦和平易，自认这一辈子，得到了过多的“不虞之誉”，因此在王朔这里受一次“求全之毁”也是应该的，把太极拳里“如封似闭”那一招的精髓发挥得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处阴守柔、内功深湛、不动声色的大侠风范。这恐怕也是使得这场论争没有能够深入与拓展的一个原因。

中国大陆最系统、全面地对金庸小说进行研究、评说的应推陈墨先生，他从90年代开始，出版了《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武学的奥秘》、《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金庸小说人论》、《金庸小说艺术论》、《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等专著，达数百万字之巨。同时，有许多学者、教授对金庸小说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因为，金庸小说进入中国大陆读者的视野后，人们很快就发现，金庸的武侠

小说，确实与众不同。一方面，它确实是武侠小说，具有武侠小说的种种元素：武、侠、传奇、男女情爱、善恶斗争、曲折的情节、丰富的悬念等等；另一方面，它又不仅仅是以往那种武侠小说，它“在对人生、人情、人性的深刻与真实的表现；对中国历史与政治的隐喻、象征与批判；对宗教、哲学理念的揭示与传达；对武学与艺术融会贯通的表现，尽力培养读者阅读与接受的通感；构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召唤结构等方面”（徐尚扬《金庸解读》，第4页），实现了对通常意义上的通俗文学的超越，“从虚构出发抵达历史真实之境”（徐岱《金庸小说论争集·论武侠文化——关于金庸小说的人文思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相对于传统的侠义小说，它又表现出一种“新”的、“异样”的面貌，它更有“文学性”。

在一些基本肯定金庸的研究者们看来，金庸小说至少有如下的与众不同之处：

一、富有人文精神，围绕着“义”，塑造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英雄人物。

二、自觉追求小说的思想性，富有现代精神。

三、贴近人生，在虚幻的故事中透露出现实人生的况味，寓真实于传奇之中。

四、蕴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并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

五、塑造出一批性格丰满的典型性人物形象。

六、融入现代文学的艺术手法，把武侠小说的表现力提升到新的高度。

七、在模式与类型中追求自己的独创性与个性。

八、情节结构具有创造性，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

在我看到的评论里，赞扬金庸的评论家们基本上还是把金

庸的武侠小说放在“武侠小说”、“侠义小说”这个文类框架里加以考察，基本上还是把它视为通俗小说而不是雅文学、纯文学及金庸所说的“正式文学”来对待。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评论者根据自己的文学立场、阅读习惯、审美趣味与价值观来对待同一个事物，作出各不相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评价，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无论说好说歹，见仁见智，金庸小说都已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客观存在。你可以扭过脸去不看它、鄙视它，但它并不因为你的不看或鄙视就在人世间消失，至于想借助某些文学以外的力量来驱逐它、打倒它、禁绝它的建议和主张，这在正生气勃勃地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大陆，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实现可能了。

金庸小说与琼瑶小说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差不多的时间里进入中国大陆读者的视野的，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琼瑶热”至少不逊于“金庸热”，“琼瑶热”甚至还改变了许多城镇青年男女的口语习惯，“好开心”、“好好玩”、“好坏嘢”等等言词从当下少男少女的口中吐出时，人们不再感到别扭。但也不过短短几年时间，琼瑶就很快从少男少女们的书桌上消失，而金庸却仍然站在千家万户的书架上。80年代出生的人，有许多又成了金庸小说新一茬的热诚读者。

金庸并不否认他是出于商业目的来创作武侠小说的，他在多种场合反复提到他写武侠小说的缘起，是为了替他的《明报》扩大销路，吸引更多的读者，是赚钱与谋生的手段。即或以商业价值而论，某种商品能够畅销数十年不衰，这其中必定有什么奥秘或者制胜法宝。文学作品当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日用品，它提供的不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所满足的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消费需求。人的精神需求具有多层次，作品性质的高低也有多层次，习惯的或简单的说法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前者高级，后者低级；前者高雅，后者通俗。按照毛泽